

编辑出版《红日》

□ 梁镇川

一

1992年,孝义中学四十周年校庆时,在校史展览室里,陈列着一本奇特的书。

这本书,名曰《红日》。说它是书,但它是蜡版刻印,纸质粗糙,并不是印刷厂印刷装订的正式出版物。说它不是书,但它有精装外壳,齐整内瓢,且有套红彩色扉页、插页,有前言、目录、后记,俨然一副出版物的格局。

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?

孝义中学老教师傅生光先生对这本书有说明的《几句话》:“我在1961年做高6班班主任时,由梁镇川、张佩文、蔚连庆等组成的课外写作组,为了向党的四十周岁生日献礼,他们自己编写、刻印,装订成了这本集子,并取名为《红日》。以现在的眼光看,不论是纸质、刻写,还是印刷、装订,其质量和工艺都是较低的。但把时间向前推移三十一年,他们能够有如此的思想境界和劳动成果,确是难能可贵的。今天,把我几经迁居尚珍藏的《红日》,作为一份礼物献给孝中四十周年校庆。过去和现在的教师、同学,如能把它翻阅一下,或许有一番情趣,至少能够回顾和了解一些六十年代初期高中学生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以及生活诸多方面的情况。”普通教师傅生光。

又过了十年,2003年我退休还乡后,当傅先生将这尘封四十多年的《红日》送到我手里时,我如获珍宝似的一页一页翻阅,仔细捧读傅先生满怀深情的情景,恍若发生在昨天;那一字一句编修,一笔一画刻写,一张一页油印,一本一册装订的点点滴滴,日日夜夜,一齐涌上心头。

二

多么令人怀念的岁月啊!高中一年级,十八、九岁,正是青春年少、风华正茂、好奇上进、充满理想和活力的年华。五星红旗下成长的青年学子,适逢党的四十周岁生日。怎能按捺住激动的心情!正如《红日》序言中写道:

“热血在沸腾,心情倍激动,四十年的一切,不能不使人放声歌唱;四十年的一切,不能不使人提笔倾泻,尽管我们知识浅薄,语言贫乏,但我们写诗千首万首,唱歌千声万声,抒发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、爱领袖的感情!”

该向党的四十周年生日献一份什么厚礼呢?我作为班团支部书记,谋划了好几天,并与班主席刘映辉召集几位爱好写作、且热心于参加班集体活动的张佩文、蔚连庆、杨正芳等同学商议,大伙一致同意我的建议,编写出版一本文艺作品集。

议案一提出,就得到班主任傅生光老师的赞许,也得到全班同学的热烈响应。大家人人动笔,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曲艺等形式,创作歌颂党、歌颂祖国的作品。不几天,便从全班同学的作品中选出二十多位同学的小说2篇、论文5篇、散文3篇、诗歌60首、歌曲2首、曲艺3篇。经过修改定稿后,就进入刻印装订阶段了。

其实,我当时谋划编印出版文艺作品集,也不是无根无据的异想天开,而是具备一定基础和便利条件的。一是班里有一个课外写作小组,团结了一伙喜爱写作的同学,大伙儿有一定的写作基础,可以创作出一些水平差不多的作品;二是早在初中阶段,我和杨正芳同学就常常被借到学校文印室刻蜡版、油印,具有一定的刻印技术;三是孝中搞勤工俭学开办印刷厂,我是校办印刷厂的小师傅,裁纸、装订、印刷技术比较熟练。写作、刻印、装订等方面的条件具备,我们便大着胆子行动起来。

三

刻蜡版的工作量最大,120多页,要在60多张蜡纸上,用铁笔衬着钢版,一笔一画,一丝不苟、齐齐整整地刻写出来,还要统一版式,调整行距、字距,设计标题、编排文字,真得费一番苦心。在钢版蜡纸上刻字,最怕刻错。一旦刻错,这张蜡纸就得作废重刻;即使用校正液,也难以达到如初的效果。所以,刻蜡版时必须专心致志,耐心细致,稍一疏忽、就出差错,也便影响印刷质量。那时,只有我和杨正芳两人会刻蜡版,既不能耽误上课、上自习,又要赶在7月1日前完成,除占用星期天外,只好黑夜加班了。在那些日子里,往往是夜里加班至凌晨两三点钟,草草睡几个钟头,起床用凉水冲一把脸,便赶着去上课。这样连续半个多月,要不是青年人精力旺盛,还真有点吃不消哩。

油印,是一项繁琐的技术活儿,且不说油印数量大,得一下一下,一张一张手工推印,单说要印得墨色匀称,浓淡适宜,字迹清楚,就不是一天两天功力可以达到的。好在我和杨正芳同学多次配合,油印质量还是蛮过关的。最为难得的是,我们破天荒地创造出在油印机上红、蓝两色套印的技术。比如扉页上的太阳,光芒是红色,云彩、边框是蓝色。献给七·一的插图,“献给七·一”是蓝色,三面红旗、鲜花绸带是红色。这就得将设计的图案,分别刻在两张蜡纸上:即将准备印红色的图,刻在一张蜡纸上;将准备印蓝色的图,刻在另一张蜡纸上。先上红色图案蜡纸,用红油墨、红滚子,推印出红色图案。再清洗油印机,更换纱窗,上蓝色图案,用蓝油墨、蓝滚子,推印出蓝色图案。难度最大的是两次印刷,要印在同一张纸上,必须达到图形合套,合铆合窍,墨色均匀,何其难哪!然而,苍天不负有心人。经过多次试验,我们

奇迹般地成功了。

装订,是只有我才能完成的技术活儿。我家隔壁是孝义城唯一的印刷行“翰墨斋”。从小耳濡目染,知道印刷装订是怎么回事。从初中二年级开始,每当学校“勤工俭学”,停课参加劳动,每当寒暑假期间,我都在校办印刷厂打工。从学徒到小师傅,类似石印机、转盘印刷机、平板印刷机、裁纸、装订等技术活,都能拿得下来。500张厚的一领纸,我脚踩着标板,手拿着锋利的裁纸刀,从对开、四开,到八开、十六开,一刀一刀裁来,不露一点刀痕,技术已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。有这样的技术,我们便在校办印刷厂一册一册地装订起来。好在各种工具齐备,又有老师傅指导,我们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操作,先将内瓢订好裁齐;再作外壳,选用赭红色油纸做封面,胶水刷得均匀,壳面裱得平展展的,又将精装外壳与内瓢钉好,裁齐;于是,一本本精装书籍便像模像样地在我手下诞生了。

书已成形,如何将书名《红日》印在封面上呢?我苦思冥想,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家父,在定好大小尺寸的纸上,写了“红日”二字。用复写纸将两字复印在封面右上角适当的位置,再用新毛笔蘸着胶水描出字型,又将金粉洒在字上,待风干后,用嘴一吹,金光闪闪的“红日”二字便在赭红色封面上显现了。至今五十多年后,“红日”二字仍清晰可见,鲜少残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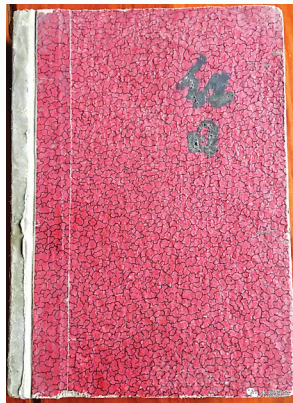
纵观《红日》,从创意、设计、创作,到刻字、油印、精装,全部出自一伙高中一年级学生之手;且是1961年困难时期,在物资奇缺,经费绝无的情况下,全凭同学们白手起家,奋力苦战,其创作意识、创造能力、奋斗精神,令人惊叹!现在回忆起来、翻看《红日》的内容、装帧,似乎有点不可想象。

四

1961年7月1日,孝义中学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大会。当我捧着一摞装帧整齐、金光闪闪、散发着油墨芳香的《红日》登上主席台,献给大会时,全场师生响起热烈的掌声。一个多月的奋斗苦战,日日夜夜的心血汗水,终于向党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,得到全体师生的赞许。

成功的喜悦,创造的幸福,令人终生难忘!

这,便是我有生以来自编自印“出版”的第一本书。



《红日》封面



《红日》扉页 梁镇川 摄

三月的记忆

□ 韩长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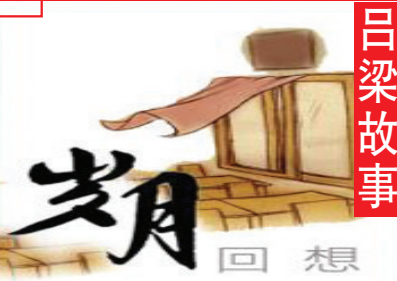
1963年3月毛主席发出号召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,此后,“学雷锋见行动”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。现在,“学雷锋做雷锋”的全民行动,也不只限于每年的三月,在每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,人们都不时的当一回“雷锋”或得到“雷锋”的帮助,且司空见惯以为常毫不稀奇,其间有几件小事至今忆起仍让我激动不已,印象非常深刻。

记得那时的义务劳动甚是平常,无论是党政工团哪个组织,只要一号召,便车子铃铃响一呼百应,齐呼啦的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。当时我在胡家峪矿南和沟坑口工作,一次由坑口机关团支部出面组织义务劳动修建篮球场,刚刚分配来矿的大学生小张因下现场来迟,什么工具也没有拿到,又不意思站在一旁看别人挥汗如雨,就挨个的央求人歇歇歇换换手,可谁都知道人多工具少,这手只要“一歇”“一换”那工具就是“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”,所以没有人“同情”他,小张见工具一时难以到手,就干脆蹲下用双手抠石头。当大家小憩喝水时,才见小张的双手十指根根滴血,团支部书记见状把铁锹

一扔,拉着他就要往医务室包扎去,小张机灵地挣脱后拾起他的铁锹笑着说:“有了这把铁锹啊,我这伤就没事了!”说着他就挥起铁锹干了起来,全然不顾还在滴血的伤口,一直干到劳动结束。

小王要结婚,大家给凑了几十尺布票,他拿着这些布票到商店准备挑选面料做床新被褥,却听到售货员们在唠河南发大水的事。小王的老家在河南,这消息无疑使他心情沉重,他听了一会之后,早已忘记自己是干啥来了,手握布票扭头走出商店径直拐进了邮局,将这在当时十分紧缺的几十尺布票和钱一古脑儿的寄给了灾区。大家见空手而归的小王,就戏谑地说:“布料给对象送去了?还没结婚就这样殷勤,婚后一准是个‘妻管严’!”小王无奈的道出了原委,大家又是一阵忙碌,捐钱捐物,等赶到邮局后,却见给灾区邮钱邮物的人们早已排起了长队。

二十八届世乒赛要开幕了,我们宿舍里的乒乓迷们个个欢欣鼓舞兴奋异常,早早的都准备好了棉大衣,准备在夜里站到电线杆下



吕梁故事

去收听矿广播站的实况转播。就在开幕的前一天,我们下班返回宿舍,老远就听到屋里谁在唱歌,进了屋却没有一个人影儿,是一台崭新的红星牌收音机正在播放着呢。我们都愣住了,不知是谁雪中送炭,你问我,我问他,大家的回答都是摇头。管他呢,有了这宝贝,我们就不怕收听实况时夜冷风寒了,在屋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万里之外传来的喜讯了,大家又是一阵狂喜。后来经多方打听,才知是老坑长所为,待世乒赛结束后,我们将收音机完璧归赵时,老坑长却说,你们弄错了,我只是送收音机的,买收音机的是和你们一样的乒乓球迷许矿长。

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几件小事,虽已过去几十年,却时不时的在我的记忆里闪现翻腾,尤其是一到每年的三月,它们总是清晰在我的脑海里,勾起我不尽的思念和回想。当然,类似这样的情景,今天也并非没有,也并非罕见。

